

我的前半生

背后的惊天内幕

THE LAST EMPEROR PUYI

王庆祥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

王庆祥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王庆祥 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201-06953-1

I. ①我… II. ①网… III. ①爱新觉罗·溥仪
(1906-1967) -回忆录-研究 IV. ①D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868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60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 一、从“悔罪手记”到“摇篮中的著作” 1
- 二、周恩来让皇帝写自传 6
- 三、溥仪的愿望 12
- 四、四年春秋 三易其稿 15
- 五、李文达与溥仪的文字缘 21
- 六、周恩来是《我的前半生》的第一读者 24
- 七、双喜临门 26
- 八、毛泽东的亲切关怀 29
- 九、老舍为《我的前半生》改稿 33
- 十、事是奇事 书是奇书 38
- 十一、从《我的前半生》看溥仪的变化 45
- 十二、“文革”中“童仆”怒骂《我的前半生》 47
- 十三、“皇娘”的反戈一击 55
- 十四、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57
- 十五、《我的前半生》的“保护神” 61
- 十六、溥仪没有遗憾 63
- 十七、电影《末代皇帝》引发著作权纠纷 67
- 十八、索要《我的前半生》印数稿酬与《火龙》开拍 75
- 十九、《我的前半生》版权纠纷一波三折 84

二十、正义在哪里？	93
二十一、人间自有真情在	98
二十二、李淑贤的未了心愿	105

附录 《我的前半生》第一稿选编

引子 幡然悔悟的中国末代皇帝	118
一、随溥仪“神游”老北京	121
（一）景山见证沧桑历史	122
（二）化腐朽为神奇的紫禁城	125
（三）风景宜人的醇王府之地	128
二、听溥仪揭秘宫廷事	136
（一）溥仪评说西太后	137
（二）慈禧与光绪的宫闱矛盾	138
（三）慈禧为何被称为“老佛爷”和“老祖宗”？	141
（四）慈禧制造的一宗宗宫廷命案	142
（五）从西太后三顿饭看清宫的奢侈与腐败	143
（六）慈禧倾轧下的光绪皇帝的悲惨境遇	145
（七）慈安太后死亡之谜	147
（八）等级森严的皇族宗派	148
（九）醇亲王府的“治家内幕”	151
三、新生溥仪重新解读中外历史	154
（一）腐朽没落的清王朝	154
（二）关门皇帝的“紫禁城”生活	156
（三）躁动的静园	170
（四）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侵略野心	177

(五)溥仪眼中的“九·一八”事变	179
(六)“恐怖事件”背后的阴谋诡计	181
四、傀儡皇帝伪满“执政”实录	183
(一)溥仪对伪满制度、机构和法令之大评述	186
(二)溥仪解说伪满国务院是个什么玩意儿	188
(三)溥仪主讲伪满“三大国策”	191
(四)溥仪眼中的伪满铁路、邮电和通讯	213
(五)溥仪所认识的伪满鸦片政策	218
(六)有名无实的伪满陆海军大元帅	220
(七)溥仪亲述伪满警察的罪恶	226
(八)伪满司法是日本军阀的一把屠刀	227
(九)伪满严酷苛刻的精神统治	231
五、囚居苏联的异国生涯	235
六、震撼溥仪心灵的沈阳审判	239
尾声 溥仪忏悔录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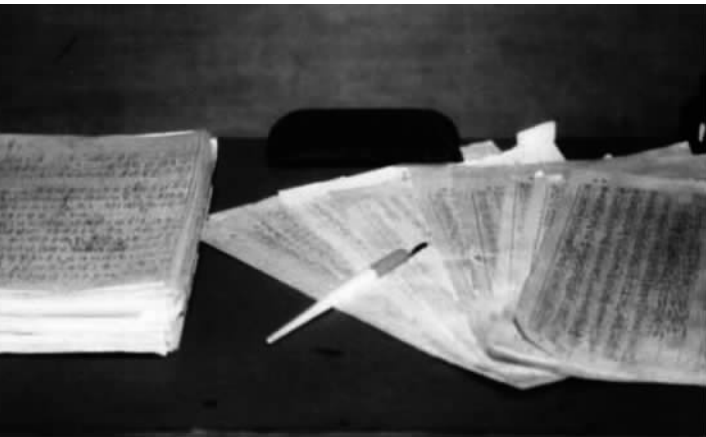
《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出版,是爱新觉罗·溥仪先生最重大的成就。这部轰动世界的著作,至今还一版接着一版地发行,当我们面前摆着这本书的时候,怎么能够忘记溥仪为它所花费的心血和付出的劳动呢?

《我的前半生》一书的撰写和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后来又发生了“文革”期间的“批判”、“自我批评”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保驾护航”,再以后则生发出李淑贤与李文达的版权确认争夺战,直到最高法院落槌宣判。目前,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这本书。有的出版社以“恢复”该书修改期间产生的“未定稿”方式,拿所谓“全本”做卖点;有的出版社则以溥仪亲属的名义“授权”,甚至不经同意,就把本人整理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作为“附录”出版,未免过分;还有的出版社又打出《我的前半生》“定本”、“全本”、“灰皮本”都出齐的旗号,让读者“对照”阅读,以便“完全还原一个末代皇帝的真实自我”。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部在半个世纪中累计印刷了200余万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呢?又应该怎样评价这部著作的内容、成书、官司和现状呢?

今据史实写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面世历程,或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在当前引发的种种新闻,预测事态发展也可能就有依据了。

一、从“悔罪手记”到“摇篮中的著作”

追本溯源,溥仪这本书的写作动机产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忆伪满年代罪恶经历的口供和笔供。



潘际垌采访溥仪写出《末代皇帝传奇》一书。

1950年8月1日,溥仪和张景惠等全部伪满战犯由苏联引渡回到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改造,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全部战犯被解往哈尔滨暂避,直到1954年春节过后迁回抚顺,随即开始了对日伪战犯的侦讯工作,这就迫使溥仪以口供和笔供的形式,片片断断地回忆起伪满年代罪恶的经历了。

1956年,香港《大公报》记者潘际垌专程前往抚顺采访溥仪,写出《末代皇帝传奇》一书,很快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宫廷轶事”、“寓公生涯”、“傀儡滋味”、“囚居境遇”和“狱中见闻”五章的篇幅,粗线条地描述了溥仪的生平。

到了1957年,一个新的令溥仪不得不回忆往事的“侦讯和战犯认罪阶段”结束以后的新阶段开始了。据当时负责与各战犯管理所联系,并处理有关日常事务的公安部党组成员凌云,在《〈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一文中叙述说: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战犯工作,一开始就制定了改造方针,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做法。这项工作自始至终由公安部组织实施……经过改造,战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造战犯的政策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出现了连国外舆论也承认的奇迹。在日本战犯中,一些战争狂人变成了和平战士;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认清了中国的命运,成为新中国的爱国民主人士;伪满、伪蒙的王公大臣,真正认识了过去卖国求荣行为的丑恶,开始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

在新的形势下,管理所领导要求正在关押的战犯,都以“我的前半生”为题目,每人写一份交代材料,实为自传式的悔罪书,就是让战犯在认罪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战犯们按照所方要求,拿起笔来总结自己的过去,从而留下一批真实而生动的认罪材料。

溥仪也在几年来陆续回忆的基础上付诸行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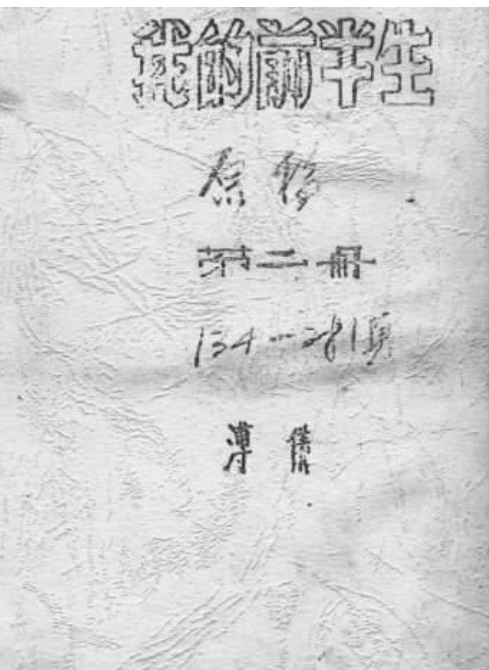
据溥仪自述,起初他只是想写一份系统的检查材料,题目也叫“我的前半生”,囊括了从家世、出身、3岁登极,按照经历的历史顺序,一直写到1957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等生平重要活动,把半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一一笔录下来,写出自己由封建皇帝改造成为新人的过程。不过,当时还没有把它写成书拿出去出版的想法,只是想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留给后人一点儿历史教训。在撰写方式上,当时想得也比较简单,大体是写一段经历,再做一篇自我批评。然而,毕竟写出了个皇帝的变化,透露了他真诚悔罪的心情。这显然有利于巩固接受改造的思想成果,而且也肯定是一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资料。

皇帝写自传,古今中外没有先例,加之溥仪经历复杂,涉及面广,内容繁多,此举在当时就备受关注,溥仪也为此经常向到战犯管理所访问的人畅谈接受改造的感受,并以终有一天将成为新中国普通平民为荣,这自然引起了战犯管理所领导的特别关注。

为了给溥仪创造较好的写作条件,让他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回忆重大问题,特派溥杰和阮振铎(原伪满洲国驻日大使、经济部、外交部大臣)协助笔录并提供线索,又找来王子衡(原伪满洲国滨江省省长)、谷次亨(原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王光寅(原伪满洲国第二军管区少将军法处长)、甘珠尔扎布(原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正珠尔扎布(原伪满洲国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等原伪满大臣和知情人,帮助提供回忆线索和历史情节,还派管理所干部特意到辽宁省图书馆借了一些晚清和民国史方面的参考



为溥仪提供线索和史实的溥杰、阮振铎、谷次亨。



《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油印本封面。

书,同时又把战犯中“满洲国大臣”一级人物、日本战犯中关东军司令官和伪满政府总务厅长官等“重量级”人物,在押期间按系统分别忆写的伪满各方面资料及侦讯资料,调出来供溥仪参考,给予了全力支持,也就是帮助他总结前半生的历史。

45万字的自传文稿写成后,又经战犯管理所领导审查、提出改写意见,并几经修改,终于脱稿。然而这部自传文稿显然还缺乏深思熟虑、精心构思和必要的核实。正如溥杰后来所说:“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①

80年代后期,溥杰应群众出版社之邀为《我的前半生》再版写过一篇序,也谈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期间写的那部溥仪自传文稿,他很谦虚地说,那只是供管理所研究参考的,他写道:

那篇《前半生》,是溥仪和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认罪阶段,努力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各自写出了一些东西之后,所方对我们的学习改造,尤其是对溥仪的特殊经历和他那几年以来的思想变化颇为重视,让我帮他去写的。其中最大部分是由他口述,由我执笔每天挤出时间去做的。大致是,从他的家世、出身到他当上末代皇帝,以及到1957年为止的一切思想变化过程。那篇东西我记得大约有四十多万字。因为那篇东西只是由亲身经历的一些素材积累而成,充其量不过是一篇自己检查过去的杂账而已,根本是不能成其为什么书的。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的环境和气氛看,出现溥杰说的那种情况不足为怪。就在那部文稿的“引言”中,溥仪自叙写作动机说:

我写的这本书就是我前半生所走过的既肮脏又见不得人的一段丑恶经历。我所以下定决心要把它写了出来的主要原因,既不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的消极心情,更不是抱定了“破罐破摔”的自暴自弃心理,而是想从我这哭不得笑不得的“哈哈镜”——说得

^① 参见溥杰:《我与〈我的前半生〉》,载《人民日报》1984年12月15日。

更确切一点儿,就是一面“照妖镜”,把我当年的这副丑恶原形赤裸裸地展现在祖国人民的面前,来表达我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同时也为了要把我这前半生50年来的一切真人真事,进行自我暴露,比较有系统地摊摆在大家面前,好从我的这段切身体验的新旧对比里,来看过去的反动封建专制制度,曾是怎样坑害人民和欺骗人民的的东西;替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孔家店”学说和迷信透顶的宿命论以及专门麻醉人民、迷惑人民的宗教等等,又都是怎样一些杀人不见血的毒刀;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又是怎样地狼狈为奸,怎样地摧毁人类幸福,妨碍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此外,还可以在这一活生生的新旧对比中,看一看我们祖国现在的新社会制度,又是怎样地优越,怎样地和广大人民今后的无穷幸福生活血肉相连,怎样地把形形色色的邪魔恶鬼——当然我更是首先应该包括在内的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科学真理,改造成为新人的事实经过。^①

我写这本书是忏悔过去,是为了要把我那丑恶的前半生,赤裸裸地暴露在祖国人民面前,说它是自传也可以,说它是我的一篇忏悔录也无妨。因为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我那见不得人的过去,一切一切,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以便把那主要病根所在,以及由于这一病根而发生、成长,以致结成恶果的一系列经过,一一加以比较有线索可寻的罗列。^②

溥仪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谈到,他写《我的前半生》,一方面表达“向祖国人民低头认罪和忏悔的衷忱”,另一方面是“让读者从自己切身体验的新旧对比里得到公正的结论”。

由于溥仪经历特殊,接受改造很真诚,心迹坦白,所说所写,昭然可信,大约在1957年底或1958年初,抚顺战犯管理所就把这份文稿油印成册,以供在本所和政法系统内部传阅。

油印稿很快就分送给国家公安部有关领导审阅,引起公安部办公厅负责人刘复之、席国光、王仲方、凌云等的重视,他们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出这份文稿,用意是好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就责骂自己一通。这种认罪过头也不是实

① 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稿“前言”,1959年写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② 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一稿“编后记”,1959年写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事求是的。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不准确。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个皇帝发生的变化,也能从近80年的动荡复杂多变的历史中大略看出社会前进的轨迹,如能加以适当整理,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再经过核实史实,就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这实际成为这本书得以修改和出版的最直接的契机。^①

大概连溥仪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这部“自传式的悔罪书”,竟然为世界孕育了一部不朽著作,这就是一经出版即广泛流传的《我的前半生》。

二、周恩来让皇帝写自传

关于这本书的修改过程,溥仪曾作过如下概括的说明:

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断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地有新的感受,又不断地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热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四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②

尽管这是一部自我暴露性质的文稿,当初本是作为罪犯交代材料的一部分而写成的,然而溥仪也曾想过把它发表出去,“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强烈”,这句话完全符合历史真实,是谁鼓励了溥仪,促其决心把一部自我检查文字材料提高为著作并公诸于世呢?第一个是周恩来。

1959年12月9日,溥仪获赦回到北京。12月14日,溥仪与杜聿明等10位第一批获赦战犯一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总理与溥仪谈心时提出希望他多写些回忆录,这使溥仪想起在抚顺写的那部长篇自传,溥仪受到那“热烈愿望”的鼓舞,遂把这事儿向总理汇报了。他告诉总理说,自己写了一

^① 凌云:《〈我的前半生〉是怎样问世的》,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②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三稿前言,1962年写于北京,未刊。

改一遍,并已动手在一部油印稿的第一分册上添字删段,改来改去。他认为,稿面潦草的这一分册应该誊清,而尚未来得及修改的几个分册则要继续修改,因此他才说“还没有整理好”。

受到接见以后,溥仪又有些担心了,遂在12月29日给抚顺战犯管理所金源副所长写信,除说明他与总理交谈的情况外,还告知自己的看法:总理很重视这部自传文稿,很可能在近期内调阅,但草稿字迹潦草难辨,太让总理费目力,因此应预先请人誊抄清楚或干脆印出来,给总理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方便。

溥仪哪里知道,早在这封信发出之前,由抚顺战犯管理所上报公安部的另外几部油印本,已经引起公安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具体安排,《我的前半生》草稿很快便用4号字排印成为16开白皮本,分三册,以“未定稿”名义铅印400部,呈送中央领导和少数相关人士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

不久,这一套三册白皮《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就摆在了总理和其他许多中央负责同志的面前。与此同时,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同意了公安部和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建议,指示作为公安系统专业出版部门的群众出



1960年1月26日,周恩来接见溥仪和载涛。

版社,也把溥仪这部自传文稿,以“内部发行,征求意见”为限,印制 32 开本上、下两册,共 7000 部,在短时间内迅速出版,“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此即 1960 年 1 月见书的所谓“灰皮本”。

摇篮中的著作就这样出世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忙中抽闲,到 1960 年 1 月 26 日接见溥仪及其家属时,那洋洋三大册“未定稿”已经快读完两册。总理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这部文稿,语气中充满了赞扬和肯定,认为它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它的毛病,把修改好这部文稿的任务交给了溥仪。

这次周恩来与溥仪谈话的目的是面商工作安排,谈话中间童小鹏插话说可以考虑“搞搞农业机械”,周恩来仍认为不甚合适。就在这时,总理忽然有所发现地把头转向溥仪:从溥仪写自传,周恩来联想到老年人的记忆力问题,对于有过重要经历的人来说,记忆力实在就是巨大财富。于是,提出了一个似乎已经离开了“面商”范畴的问题。

周恩来:你的记性怎样?

溥仪:记性不好。

周恩来:你写的那个材料上,想出那些东西不容易。

溥仪:那是别人帮着搞的。

周恩来:你的记性还不错。

不过有一点:你说你结婚时黎元洪还当总统,有点儿不对。

溥仪:不是,说的是徐世昌。

周恩来:你是哪年结婚?

溥仪:1922 年。

周恩来:那时徐世昌也不是总统了,这里有点儿出入。

溥仪:那还只是稿子,还要修改。

这次谈到溥仪的记忆力,是因为那部自传文稿涉及了溥仪大婚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从史实看,黎元洪于 1916 年 6 月继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至 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时避难去职,由冯国璋代理总统。1918 年 10 月到 1922 年 6 月徐



冯国璋(1857—1919)。



黎元洪(1864—1928)。

世昌为总统。1922年6月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又复任总统,直到1923年10月让位于曹锟。溥仪大婚在1922年12月1日,其时民国总统确为黎元洪,他还曾遣使入宫致贺呢。从周恩来与溥仪的对话来看,两人的记忆均有误。当然,这里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史实的细枝末节,总理从溥仪的回忆中发现了他那份自传文稿的价值。

虽然如此,周恩来仍很满意,总理是从思想改造的角度评价溥仪那份自传文稿的,阐述了它的重大价值。周恩来认为,溥仪是世界唯一接受改造的君主,他的自传就是铁证。

总理对溥仪说:“你写的东西有40多万字,因为总有事,我还没看完。春节后我要出去,现在先和你谈谈。与英、德、俄等国的皇帝、亲王相比,

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你没有在回忆录中吹捧自己,而是暴露自己。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向旧社会宣战,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斯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创造了一个新纪元。”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赞扬溥仪“创造了一个新纪元”。赞扬并不过分,溥仪在苏联囚居期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都不敢承认的一些罪行,却在“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中写了出来,说明他在改造中真的进步了。

周恩来肯定了溥仪自传的价值,这就为后来公开出版《我的前半生》奠定了基础。总理一方面肯定了溥仪的改造,当面给予鼓励,要求他巩固自己的改造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求他认真修改自传,对溥仪来说,这两件事本来就是统一的。

总理说,从1950年7月引渡回国算起才10年,从1945年8月被俘入苏算起不过十四五年的,“而且头几年你还不安心,这也很自然,不奇怪,怎么会一下子就相信?如你七叔现在是人民代表”,总理说到此处把头转向载涛,“原来找你做政协委员时,你就相信我们吗?”总理就溥仪能够写出“我的前

半生”自传文稿评论说,“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是后几年的事”。

对话继续进行。

周恩来:你写的东西用了多长时间?

溥仪:一年多。

周恩来:这证明你后几年进步了,但不能说巩固。

周恩来:你写的东西有价值,现已作为未定稿用4号字印了出来。

送给你一本,你再改,改得完善些,改到在历史上、在世界上都能“站得住脚”。这是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旧社会结束了,你也转变成了新人。

总理环顾周围,对大家继续说,你们不要责备他。这本书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会说,最后一代的皇帝给共产党改造好了,能交代了,别的皇帝就不能交代。

对于修改书稿,总理也提出了方向性的建议,要求溥仪首先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核实每一条材料,做到准确无误,更要有战斗精神。

溥仪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人民的,要尽一切力量做好,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总理的期望,一定不辜负。

周恩来针对“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发表的看法,正是今天世界通行的那本《我的前半生》的最好的序言。虽然并没把这些看法印在书前,但那本书的确是从这次谈话中走出来的。因为周恩来作为中央领导人,第一个站出来肯定了那部“我的前半生”自传文稿的价值,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频仍、政策极“左”的年代里,这个奠基的工作非周恩来莫属,别人难以替代;还因为周恩来客观地指出了那部自传文稿尚不是“比较完善的”,需要修改。这就为后来公开出版的《我的前半生》规定了明确的质量标准,使其成为一本好的畅销书。

周恩来是溥仪那三大册《我的前半生》“未定稿”第一个最热心的读者。中国新闻记者访问溥杰先生的时候,他还谈到总理对《我的前半生》初稿提出的一条意见。他说:“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我的前半生》,当时是我记录整理的。那时每写一件事后面都跟着一大篇检讨。周总理看后笑



周恩来一直在关注《我的前半生》。